

当代苏联文学丛书

石可逆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不可逆转
BU KE NIZHUAN
(当代苏联文学) 编辑部选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北京市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32开 1/32 11.25印张 247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7-5600-0404-0/I·15 定价: 2.50 元

前 言

本书包括两部小说，一是苏联老作家萨赫宁1983年发表的《不可逆转》，一是萨波日尼科夫和斯捷帕尼金1982年发表的《海滨疑案》。两部作品都取材于今天的苏联现实，以深刻的道德涵义、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尖锐的冲突和曲折的情节为特点，所以作品一发表便获得苏联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不可逆转》采用了倒叙手法，一开始便是鼎鼎有名的光明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古雷戈被开除出党的场面。为什么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游队员，一个誉满全州的先进生产者，会被开除党籍呢？小说设置了一个悬念，吸引着你往下读。随着情节的展开，记者克雷洛夫顶住重重压力，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形象越来越鲜明，而欺世盗名的古雷戈及其影响深广、阵容庞大的关系网则一步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小说的名字旨在说明，不管历史出现什么曲折，也不管恶势力一时多么猖獗，真理和正义终将胜利，这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规律。

阿·萨赫宁1910年生，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黎明的乌云》（1954）、中篇小说《岁月飞驰》（1957）、《决斗》（1959）、《惨祸前三分钟》（1961），特写集《陌生人》（1961）、《如此众生》（1964）、《不同的命运》（1964）、《原来如此》（1968）、《苟度此生》（1970）等。

《海滨疑案》围绕着一个优秀的九年级学生尼基塔不明不白的死展开情节，涉及今天苏联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学校生

活，描写了中学校长、教师、企业经理、老游击队员、学生、司法人员，少年犯罪分子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不仅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情节起伏跌宕而又真实可信的故事，而且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从尼基塔之死中，应得出什么教训？社会、家庭、学校应当怎样了解、关心和爱护青少年？怎样才能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譬如小说中的班主任罗马申娜，尽管专业知识丰富，课堂纪律好，对学生严格要求，被公认为一名好教师，但作为一名灵魂的工程师来说，则大有缺陷了。她内心冷漠，缺乏对学生真挚的爱，从而也就不能真正了解学生，对学生的看法也就不免有时主观武断，影响到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作者通过这一人物表明，老师应是学生的道德表率 and 知心朋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美好心灵的塑造者。

希望这两部小说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苏联文学和苏联现状。

编 者

目 录

不可逆转

阿·萨赫宁（1）

金起 靳慰然 译

海滨疑案

列·萨波日尼科夫（244）

格·斯捷帕尼金

田守文 田毓筠 译

不可逆转

阿·萨赫宁

金起 靳慰然译

—

党州委会开得紧张热烈。会议临近结束时会场上鸦雀无声。横贯会议大厅的笨重的会议桌旁坐着三十来个人，个个缄默不语。有的人低头看着脚下，象是不敢把头抬起来，另一些人不时地向那个满脸通红、心情紧张的人偷偷瞄上几眼。此人惊惶失措地四面顾盼，眼睛里充满绝望的神情，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象是在乞求别人能替他说几句好话。

不论他看谁，大家都把脸转向一边。

全体与会者都一声不吭。

“这可真是天大的误会，”他终于有气无力地开口说道，“实在让人莫名其妙……”

州委第一书记兹万诺夫站了起来。他语调平稳、态度坚定地說道：

“我再一次要求你把党证交出来。你也看到了，决议是一致通过的，”他转身向党委专案委员会主席说：“丘贡诺夫同志……”

丘贡诺夫走到被开除出党的那个人身边，那人慢腾腾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夹，然后又动作迟缓地从中取出了党证。

这是个山羊皮封面的小本子。他从来也没想到过要仔细看看这个小本子。至于保存好，那没得说，他一直把它放在存放

公文的保险柜里。每当需要去州委或其他的党的机关时，他就取出带在身边，进门时只需拿出给看一下，连打开也用不着。交党费时他也没仔细看过，党支部书记自己会翻到那一页，填上每月工资数额，应交多少党费，然后签上名，盖上一个小小的紫色印章。每月盖一个，每页有十二个印章，一页表示一年，一生中的一个年头。

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眼前浮现出昔日一年年的情景。近十年曾换过多少书记呀，工资的数额也在变……不，这不单单是些数字，这数字说明，他这些年来担任过什么职务，表明他是在步步升高。瞧，这是最后的一个职位，最后的一个制高点，看上一眼都会使你头发晕。可在此之前，怎么没意识到这一点呢……啊，这是最后一页，都已填满，再往后就都是空白的了，上面只有“月工资数额”，“党费数额”，“书记签字”，还有十二个空格。今后不会再有人去填它，不会再有人去盖章了……

他翻动着空白的纸页，空白页也到了尽头，再往后就是封皮，再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党证到此为止，生命也到此完结……

丘贡诺夫似乎不愿去惊动这个陷于如此可悲境地的人，但又要催促他，于是咳嗽了一声。那人只抬了一下茫然若失的双眼，接着又去盯着自己的党证，他慢慢地将党证从羊皮封面中抽了出来。

他并非珍爱这个羊皮封面，而是身不由己地拖延时间。就如此随随便便地把党证交出去，他实在不心甘情愿，这是永远交出去啊。人家会在党证的第一页上用墨笔划上叉子，那叉子将从他照片的脸上划过，然后盖上最后一个大而粗的印记：“吊销”。这意味着他这个人被吊销，被除名，被从生活中一

笔勾销。人死之后，党证就是这样被吊销的。

大厅内沉闷的缄默被突然响起的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打破。那个刚刚还表情凄惨可怜的人，现在抬起了头，大声叫道：

“党证是你发给我的吗？！”他的脸涨得通红，脖颈上暴起青筋，两颊的肌肉也因咬牙而颤动，眼里射出怒不可遏的凶光。“是不是你发给我的党证，我问你！党证是我在战火中得到的，是用血换来的，说什么我也不交出！”

二

有谁能事先猜测到，何时将有大难临头呢！记者克雷洛夫来到州首府鲁昌斯克的时候，他情绪极好。

他把手提包存放在行李寄存处，把号码锁上的数字拨到同自己汽车的号码一样——这号码一辈子就用这么一次，有何必要非想出个数字，然后把它写在本子上，或更糟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呢。

克雷洛夫来到车站广场就迈开大步朝前走。他有着一幅线条粗犷的宽大脸庞，他那美丽的波纹状卷发已是斑白如霜，但他体格仍很健壮，体态挺拔、匀称。完全看不出，他人已过中年，而且身上还残存着三块弹片，腿部有多处战争留下的深深的伤疤。

他学的专业是机械工程，可一天也没干过本行。三十年代克雷洛夫曾就读于工业学院。他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之所以上那个学院是因为学工那时受人尊重。学社会科学被认为没有出息，况且他对社会科学更是兴味索然。他那时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实际上他无所追求。

靠助学金无法维持生活。父亲早已去世，也没人供他读书。同班有些同学靠在铁路仓库搬运包裹挣钱。他不愿干这种

活。一些神通广大的在糖果点心厂找到了工作，抬运饼干箱。这活较轻松，而且还有便宜可占。饼干虽无法从工厂弄出来，可他们都能吃得肠满肚饱。克雷洛夫不属于神通广大之列。他幸运地在一家部门性的报纸编辑部找了个助手性的工作。说是幸福嘛……其实真还不如去当搬运工……。不是让你去检查某个宿舍是否真的垃圾成堆，就是让你去工厂搞清解雇会计的缘由，再不就是让你去了解，电车为什么出了轨……

你去核对、查实、了解、审核文章需用的材料，可那位老兄却象老爷一样，往那儿一坐，用你准备好的现成材料去撰写文章。那怎么着，人家是名记者呀……对这些打杂的活儿根本不屑一顾，而且还会挖苦地问：“塔吉雅娜·拉林娜^①的父称是什么？”他怎么能知道塔吉雅娜的父称！普希金只给她起名叫塔吉雅娜，有时提到她姓拉林娜。从来没提到过她的父称。

编辑部的人常拿他取笑，这使他实在难以忍受，可又不知如何作答，心中不免常常气恼。这种受欺压的感觉随着时间的转移日益强烈。甚至一些任务在他看来也是有意让他难堪，甚至含有侮辱性质……没关系，他早晚会出人头地的……可什么时候呢？怎样出人头地呢？反正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就是了。他对此深信不疑。

谁也没交给他写文章的任务。一天，他看到一位老年妇女受人欺侮，他决心为她鸣不平。他尽力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地位，深刻体会、感受那位老太婆当时的痛苦心情和孤立无援的处境，写了很久。渐渐地他觉得那老太婆的心情和处境和他本人的痛苦及他本人所受的抑郁难忍的屈辱是相通的。编辑部交给他的很多任务和那些无恶意的戏谑，他都认为带有侮辱性质，他象是把自己受侮辱而郁积在胸中的怒火全都发泄了出

^①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

来。

短评里没有大声疾呼的词句，文章写得似乎缺乏热情，然而却能激起读者的愤慨，谴责这种道德败坏的现象。文章未经修改和删减就发表了，在编辑部例会上还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短评发表的那一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无比幸福。整整一个星期，他一回到宿舍，立即从床头小柜里将报纸取出，一面不时警觉地看看屋门——怕同学中有谁会突然闯进来，一面欣赏那篇文章，长久地盯看那用黑体字排印出的自己的名字。

一篇短评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犹如从泥泞难行的小路走出，来到平坦的大道上。他以满意的心情回味着自己的初次创作，同时脑子里又开始酝酿新的作品，寻找新的题目。现在编辑部交给他的任务，虽然和过去一样依然引不起他太大的兴趣，但他不再认为是故意使他难堪了。搬运包裹不是也没什么乐趣可言吗。有什么办法，总得找工作做。真是天赐良机，他找到了对付编辑部里那些爱讲挖苦话的人的办法，人们已经不敢轻易就拿他取笑了。不久报上又刊载了他的第二篇作品，也是篇短评。

他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他成了编辑部一名正式成员，学院毕业文凭他是以自学考试方式拿到的。他一生对自己新的职业始终不渝，只是战争刚开始时有段短暂时期例外。

当时他在塔斯社工作，已二十五岁，并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他未被征召入伍，给他发了留守证。一天突然叫他立即到区党委会去。区党委办公室内除区委第一书记外，还有一个身穿铁路员工制服的陌生人。一阵与事无关的寒暄后，第一书记问克雷洛夫是何职业。这问题使克雷洛夫感到惊奇。第一书记

对他十分了解，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也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提这样的问题呢？

“记者……”克雷洛夫惘然若失地回答说。“但学的专业是……”

“不是，”书记打断他的话。“我是问，上大学前你做什么工作？”

“在机车库里做钳工，后来在机车上……”

“这就对了，”书记又没让他把话说完。“你知道，现在西部车库缺少司机助手，无人运送弹药。”

克雷洛夫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这多少使他良心上得到安慰，不然，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他这个年轻力壮的伏罗希洛夫射手却坐在大楼里办公，楼内大部分是妇女、老人和残疾人，很少有年轻人。

克雷洛夫给总编辑留下个字条就到车库去报到了。人们不会再把他的看成是临阵脱逃的人。

有三个月时间他开着火车运送军事装备、弹药和部队，经常遭遇敌机轰炸。后来从白俄罗斯撤退下来一批火车司机，不需要他了。克雷洛夫找到军事委员会，那里的人跟他说，他有留守证，不能安排工作。没办法，他只好回原单位工作。在回家的路上他可巧遇到他上大学时工作过的那家报纸的编辑部主任秘书，此人现在是前线某报纸的编辑。这位编辑在军事委员会替他办好手续，把他拉到自己的编辑部里。

自那以后一晃过去了三十多年。现在刊登克雷洛夫文章的报纸人们竟相传阅，还不时地引起延续数日的激烈争论，其影响常常数年后还都能感觉到。他不止一次地鞭挞人们的恶习，揭露不称职人的丑行，他对此感到满足，但真正使他感到快慰的，是当他颂扬那些英勇而又有才干的人们，展示他们刚毅和

始终如一性格的时候。

克雷洛夫到鲁昌斯克来的目的就是采访这样一位人物。是他自己建议报导此人，更确切地说，报导此种人的。

每逢报纸需出版专刊纪念有重要意义日子的时候，总编辑乌达洛夫就会把一些人召集在一起，他开玩笑地把这些人称做是神经中枢。这样叫惯了，大家也习以为常，就不再觉得是开玩笑。参加神经中枢会议的人不是根据工作人员的级别或职位，而是看他是否富有强烈的首创精神，思想是否活跃，想象力是否丰富。

会上只研究一个问题，即如何更好地出版这期报纸，如何使其更具有独创性，使人更感兴趣。会议没有主持人，也不规定议事日程，不做记录，大家发言来，就象有个人说的，如同是在“发呓语胡言”一样，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哪怕是最荒诞的建议也不会遭到斥责或讥笑，只是不采纳罢了。

在编辑部最近一次讨论如何纪念胜利日的神经中枢会议上，他提出应报导一位原来不为人所知，但在对敌斗争中却不仅表现十分英勇，而且组织才能出众，具有非凡组织能力和才干的这样一位战斗英雄。要使人看到，他在战争中显露出的品质，在今天他所担负的领导工作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建议被采纳了。

列米佐夫是全国最大的总管理局之中的一个总管理局局长，克雷洛夫找到他，他推荐了一位最合适的人选。此人曾是个英勇善战的坦克排排长，曾多次冲入敌人后方去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和军事设施。在一次战斗中，他身陷重围，后在敌占区的密林中隐藏了下来，并很快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打击敌人。现在他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的生产联合公司的总经理。

这可真是最理想不过的人选了。想报导的正是这样的人

物。更何况此人的姓也不错。

克雷洛夫很重视人的姓氏。他明白，这毫无道理，但他往往很难提笔去写一位英雄，如果这个人的姓，象他所说，听起来女里女气或者软弱无力。

而这个人姓，你听——古雷戈！彼得·叶利扎罗维奇·古雷戈。意志薄弱的人或胆小鬼绝不会有这样的姓。克雷洛夫觉得这个姓包涵着勇敢和坚毅精神。

现在他就要和古雷戈会面。古雷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克雷洛夫对古雷戈已了解不少。他多年来总是习惯于先收集有关材料，最后才和自己要报导的主人公交谈。这次也不例外。他先采访了古雷戈当年打过游击的地方。他来到区首府利潘，是因为他想起列米佐夫曾讲过：“古雷戈是个谦虚恭谨的人，他不会向你谈他自己的。所以我建议你去区战斗事迹博物馆看看。至于有关他目前工作的材料，我们会提供给你的。”

利潘市博物馆内有关古雷戈在战争时期的事迹确实收集了不少材料。这里还陈列有他写的回忆录。克雷洛夫小心翼翼地翻看了头几页，唯恐这个在他心目中已树立起来的形象被作者常用来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我”字所推翻。还好，谢天谢地，克雷洛夫觉得，作者对自己所走过的斗争道路的叙述是恰如其分的，没流露出那种一般常有的沾沾自喜的弱点，相反，他在叙述坦克攻击战及后来的游击队英勇出击战斗中，对本人所起的主导作用都没做过多的渲染描述。然而，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在你脑海里会留下他的英雄形象的。

克雷洛夫身上有着两种看来是截然相反的品质。他平日为人不拘小节，不是处处事事都有条不紊，有时甚至表现得满不在乎，更主要的是他很容易轻信别人，可当他准备写某个人的时候，他又会变得对细小事物也要仔细推敲琢磨，绝不马虎从

事，对每件事、每个细枝末节都要通过各种途径去反复查对，象是对自己也有些信不过。

克雷洛夫对古雷戈的生平事迹有了详尽了解后，又来到区党委会，征询区党委对发表有关古雷戈的特写是否持不同意见。区党委第一书记伊萨耶夫很得意地看了克雷洛夫一眼说道：



“我们这个地区就是靠象古雷戈这样的人支撑门面。早该报导了。”

克雷洛夫来到鲁昌斯克时，情绪十分高昂。他极其重视将要进行的会晤。脑子里已酝酿成熟那篇特写的轮廓，可似乎还缺点什么，也许缺的是主人公本身的感召力吧。

三

每初到一个城市，克雷洛夫下火车后都不乘车。已是四月时节，阳光灿烂，但仍可感到寒意袭人。他没戴帽子，敞着衣领走在大路上，欣赏那美丽的街道和耸立的高楼大厦，整个城市象新建的一样。要不是克雷洛夫知道这座城市在俄罗斯土地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他或许真的会认为这是座新建的城市。看来，战争把这座城市破坏得相当严重。

路上行人都已换上春装，正匆忙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一辆接着一辆陆续开来，满载着乘客又开走了。广场上一辆伊卡鲁斯牌大桥车正拐了过来。他看到中央饭店门前正聚集着一大批旅游者，心想：“大概是来接他们的。”

克雷洛夫借助在火车站买的城市地图，没费什么气力就找到了他要找的街道和公司大楼。他是不大愿意截住过往行人问路的。

宽敞的接待室里已坐着几个人。古雷戈办公室门口的桌旁坐着一位威风十足的女秘书。

对女秘书克雷洛夫有自己的一套——要时刻保持警惕，不可轻信。这些人有时象盾牌一样往往不加分析地就给她们的主子打掩护，对来访者和打来的电话一律加以拒绝。那高傲的神态，神秘莫测的面部表情，冷若冰霜的目光，嘴里还念念有词：“正忙着……不会很快……不清楚……再来电话吧”。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是这么一套。管你是请求，哀告还是威胁，对这样的女秘书一概不起作用。她一见到来访的人，脑子里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尽快地把他打发走。

这样的女秘书克雷洛夫遇见的多了。他知道也有另一种情况。态度认真、肯动脑筋的女秘书可以大大减轻顶头上司的负

担，对人们要办的事和利益还毫无损害。和来访者一接触她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做出判断，来访者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人专门好打官司，应尽快把他打发走，这第二个没什么大事，不通过领导人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而这个人的问题十分重要，领导人应抽时间和他研究，于是马上定下他与领导人会面的时间。

女秘书名叫安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她冲克雷洛夫点头回答他的问好，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古雷戈同志在吗？”

“在，可他正忙着。您有何贵干？”

“怎么跟您说呢？……我有很多问题找他。”

“这是可能的，您直接找具体负责人谈不是更好吗，要不……”

“不，我只能找他本人。”

响起一阵轻微的铃声。

“对不起，请稍候。”她只开了一个门缝，侧身走进去就把门关了。克雷洛夫不习惯在紧闭的门外等候，他无所顾忌地把门一推，大步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宽敞的布置得严肃整洁的办公室，墙边和长长的会议桌旁摆放着很多椅子。

古雷戈有六十岁左右，仪表堂堂，有副聪颖、刚毅的面孔和一双和善的眼睛。克雷洛夫进去时正赶上电话铃响，古雷戈没注意到他，伸手拿起话筒：

“喂！”

安娜愤懑地看了他一眼，疾步向他走来，克雷洛夫站在门旁一动未动。安娜向他提出责备，要求他马上离开办公室。克雷洛夫听她讲完，什么也没说，一屁股坐在身边的椅子上，干脆不走了。安娜还在小声地说个不停，他根本没去听。

“怎么能这样呢！”不知古雷戈在严厉斥责谁。“丘马科夫已连续三年到你们那里登门求援，可你们一直无动于衷。你们有责任给他修理……他在森林里挨冻打游击时，上级给他拨过钱吗？”总经理很气忿地说。“他为祖国战斗流血的时候，又有谁给他输过血呢？可你们……你们哪，不就那么十来块木板吗……房子已太破旧，那就更应该嘛。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真是见鬼。”他坐在椅子上一下把身子转了过去。“老革命，老游击队员，却住在破房子里，这已经不是什么修缮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能明白这一点呢！……当然……”他的声音又变得平和了，“我懂……那么给我增建那间新房的事呢？”

克雷洛夫坐在门边一直很感兴趣地听着。女秘书已不再指望能把克雷洛夫从屋里赶出去，又没有办法找人帮忙，于是就象个保镖似的站立在他身旁。

“明白了……”古雷戈不动声色地又拖长声音说了一声。突然他提高了嗓门：“那么好吧！明天一清早你就把那两个工作队派到丘马科夫那里去，不要派到我那里去了。今天，你听见了吗，今天就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包括最后一块砖，最后一块木材，从我那里运到丘马科夫那里去。象你们常说的，保证明天一清早就进入现场施工。明白吗？在丘马科夫的房子没修好之前，你听见了吗，没把他那里的剩余建筑材料全部收拾干净之前，不许往我那里派一个人。明白吗？”他气呼呼地丢下了话筒。

“这些可恶的溜须拍马的家伙，该死的官僚主义者……”

“古雷戈同志！”安娜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指指客人说。“闯进来了……没得到允许……”

古雷戈象是现在才看到来访者。

“同志，您有什么事？”

克雷洛夫非常兴奋。刚听到的正好可以作为文章的开头。